

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

第 9 期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001年8月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九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輯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贊助

民國九十年八月
中華民國 臺北市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呂芳上 李貞德 林麗月 胡曉真 曼素恩 (Susan Mann)

陳慈玉 游鑑明 鮑家麟 賴惠敏 羅久蓉 高彥頤

執行編輯 游鑑明

助理編輯 張秋雯 何淑宜 莊佳玲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九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臺北市 南港

印刷者 辰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78巷2弄3號

定價 平裝 新臺幣300元・郵撥訂購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 1034172-5
帳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出版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稿約

- 一、本刊於每年六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年三月三十一日。
- 二、本刊為一國際性的學術刊物，園地公開，凡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之中、英、日文論著（不超過二萬字）、學術討論（不超過一萬字）、研究動態（五千字為原則）、書評（三千字為原則）等，均所歡迎。論著請依照一般學術論文加註格式撰寫。
- 三、來稿以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者為限；如經發表，版權即屬本刊所有。
- 四、來稿一律交由本刊編輯委員會聘請專家學者審查。
- 五、來稿如因時間過遲影響出版進度，本刊編委會得斟酌情形，將該稿移至下一期出版。
- 六、來稿刊出之後，一律贈送本刊五冊；另贈送抽印本二十冊，不另致稿酬。
- 七、來稿牽涉版權部份（如圖表及較長篇幅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 八、來稿請註明姓名、工作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號碼，以便聯繫。
- 九、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收。為恐稿件遺失，請自備底稿。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第九期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出版

目 錄

論 著

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

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胡 纓 1

法理與私情：五四時期羅素、勃拉克相偕來華

引發婚姻問題的討論 (1920~1921).....呂芳上 31

「性感野貓」之革命造型：

創作、行銷、電影女演員與中國現代性的想像

(1933~1935).....周慧玲 57

✓ 千山我獨行？

廿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游鑑明 121

學術討論

中國的歷史與性別

..... Rebecca E. Karl 著；呂妙芬、許慧琦譯；楊芳燕校訂 189

從婦女史和性別史的爭議談美國婦女史研究之發展

.....俞彥娟 207

研究動態

美國華裔婦女的研究及其方法論.....令狐萍 235

書 評

評介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蔣竹山 255

婦女運動與運動婦女：

評介《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連玲玲 267

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 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

胡 纓

摘 要

本文以梁啟超 1897 年寫的〈記江西康女士〉一文為核心文本，比較基督教會歷史檔案及康女士自己的作品，藉康女士這一具體例案，探討性別觀念與近代歷史書寫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梁啟超的〈記江西康女士〉，勾畫了一個「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的新式女性康愛德，使她成為古代才女的對立面，成為歷史發展的化身，中國前途的希望。這個「歷史發展」「中國前途」是有特定歷史含義的，是戊戌變法前夕維新派的歷史構想。基督教會當時所設想的「歷史發展」「中國前途」與維新派有一些相同之處，甚至有些語言也十分相近，如鼓勵女子教育等等。教會檔案中稱康女士作「孔子嫡傳後裔」，更頌揚她為「基督徒的優秀榜樣」，當然最終教會認為中國的前途應是全面信奉基督教，而這是維新派所未能苟同的。以這兩大語系為框架，關於康女士個人的故事的不同版本就必然對歷史有選擇有拋棄有掩埋，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個版本的故事之所以講得圓，就是因為康女士

一生中某些成份已經被遺忘了。

晚清歷來被認為是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折階段，但當我們從性別這個角度對這一史觀加以審視時，我們發現「傳統」與「現代」都被賦予特定的性別色彩，抽象的歷史階段從而變得戲劇化形象化，某些個人或群體便成為某一時代的典型代表。具體地說，受傳統教育裹小腳的舊式女子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標幟，類似康女士這樣的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新式職業女子則與中國的未來緊密聯繫在一起。這一歷史敘述對於 20 世紀長大的人們來說，幾乎成為不言而喻的常識，毋庸置疑的真理。但追溯歷史淵源，這所謂歷史常識其實恐怕是晚清民初製造出來的一種很有吸引力的而且相當耐久的歷史敘述。而我們知道，任何歷史敘述本身必然是建築在對另外一些沒有被寫入歷史的史實的否定和遺忘上的，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敘述自然也不例外。

與其他近代史上的名人不同，康女士從小生長在晚清社會邊緣上，而中國近代歷史社會的滄桑變故使她在上個世紀末一夜之間忽然成為眾目睽睽的新式女子，轉眼之間成為歷史核心人物。康女士這一個案的有趣之處就在於她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恰恰是晚清歷史一個側面的寫照，從而使我們得以仔細觀照一個現代神話的創造過程。康女士這一個案因此印證了一個歷史的悖論：雖然「新女界」「新女杰」這類詞彙在晚清文章中屢見不鮮，似乎被賦予很重要的涵意，但是這類詞彙的歷史可釋性是建築在對真正生活中女子遺忘上的，具體說，「新女子」的前身「才女」從此被貶為「舊式女子」，而「新女杰」本身任何不夠「現代」的因素也被掩埋被遺忘。從康女士這一個案我們清楚地看到，搬演「現代」這齣戲，即使在晚清民初之際，也是充滿了矛盾和爭議的。

關鍵詞：梁啟超，性別觀念，現代，歷史書寫，康愛德

The New Woman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he Case of Kang Aide

Ying Hu

Abstract

Hailed as the first female medical doctor of China, the exemplary new citizen of the burgeoning Chinese nation, and a model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Kang Aide (1873~1930) is a figure to whom others attributed tremendous representational power as well as different meanings. Comparing three versions of her story, one by late Qing reformer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one by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one by herself, this paper traces the enactment of modernity at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 an enactment fraught with ambiguity and contested at the very moment of its conception.

As a primary way of signifying difference, gender was one of the most potent metaphors of the late Qing. The status of women was intimately linke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s the image of the traditional woman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ast and that of the modern woman rhetorically wedded to the model of progress. The late Qing, once described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yields fascinating stories

when we shift our atten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tself, in other words, to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narrativization of history.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making, critics have recently argued, necessarily suppresses other stories; that is to say, the intelligibility of history is predicated on what is repressed and forgotten. As gender figured prominently in the narrativization of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its intelligibility also depended on what was forgotten. Seen in this context, the late Qing is not so much a transitional period as a period that originated a particular and gendered version of tradition in an effort to produce and enact a particular and gendered modernity.

The case of Kang Aide is interesting because of her apparent centrality as well as her hidden marginality to various projects of modernity. Her case illustrates a peculiar historical paradox: while the term “woman” was given tremendous representational power in the late Qing, its existence and intelligibility was predicated on what was forgotten about women, that is to say, both her predecessors who were dismissed as “traditional” as well as elements in her that were deemed less than modern. Through the case of Kang Aide, this paper traces the enactment of modernity at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 an enactment fraught with ambiguity and often contested at the very moment of its conception.

Key Words: Kang Aide, Liang Qichao, nationalism, gender, historiography

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 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

胡 纓^{**}

光緒 23 年 2 月 21 日 (1897.3.23)，梁啟超在他主筆的《時務報》上登出一篇小傳，題為〈記江西康女士〉，文章極力頌揚一年輕女子，名康愛德，日前剛從美國密爾斯根大學拿了醫科學位歸國，女士「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¹ 梁啟超將康女士與晚清中國女子相對比，認為她迥然不同，文章結語則希望「海內二萬萬之女子皆如此類」。當時，戊戌變法尚在醞釀之中，女子教育還在雛形階段，出國留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China Semina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1988/6) a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1998/3) 學術會議。部分內容將以 “Naming the First New Woman” 為題出版於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本文作者在此謹向貴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南昌的各位朋友同事及 General Commission on Archives and History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the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the Library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一併致謝。

** Associate Professor,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¹ 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飲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卷 1，頁 119-20。

學更是絕無僅有，甚至「新女性」這個名詞也還要幾十年後才流行起來。梁啟超筆下的康女士可謂開一代之先河，不啻未來現代中國女子的楷模。

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教會（後稱衛理公會，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歷史檔案館裏有一個不很厚的傳教士個案，歸在 Ida Kahn 名下，內中存有一百多年前的舊照片，發黃了的新聞剪報，老式打字機打出來的推薦信等等，這些信中不斷有教會人士稱 Ida Kahn 作「孔子嫡傳後裔」，更頌揚她為「基督徒的優秀榜樣」。檔案中唯一的中文文獻是一份追悼會請簡，並附「訃告」及一篇頗詳實的〈吳女士歷略〉，署名「不孝女康成」。

康愛德，Ida Kahn「孔姓」，康成，同指一個人。但不同的姓氏及不同的名字，意謂著不同歷史集團或群體的從屬，也因此被賦予不同的歷史涵意：康女士究竟是現代中國女子的楷模，還是「孔子嫡傳後裔」，還是「基督徒的優秀榜樣」？這幾種不同的群體從屬相互是否很和諧，之間有沒有矛盾？這其中隱含的對傳統與現代的概念，中國與西方的相對位置的詮釋有甚麼不同？本文試從這幾個問題出發，分析〈記江西康女士〉，教會檔案及康女士自己的作品這三種不同的歷史文本，目的是藉康女士這一具體例案，探討性別觀念與近代歷史書寫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性別，無疑是有史以來人們藉以區別事物的基本符號之一，這在變化紛繁的晚清，自然也不例外。甲午戰爭以降，「興女學」「新女界」之類詞彙屢屢在新派文人筆下突顯，一時間「女子地位」不僅成為中外文化傳統差異的標幟，而且成為中國的過去與中國的未來的分野，性別觀念因此幾致成為文明進化的象徵，成為歷史書寫的隱喻。²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

² 關於性別觀念與國家主義 20 世紀以來的關係，近年多有學者著文，例如 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7: 4 (1998): 287-308; Christina K. Gilmartin, "Gend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Women's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4~1927," in Gilmartin, Hershatter Rofel, and White eds., *Engendering*

晚清歷來被認為是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折階段，但當我們從性別這個角度對這一史觀加以審視時，我們發現「傳統」與「現代」都被賦予特定的性別色彩，抽象的歷史階段從而變得戲劇化形象化，某些個人或群體便成為某一時代的典型代表。具體地說，受傳統教育裹小腳的舊式女子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標幟，類似康女士這樣的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新式職業女子則與中國的未來緊密連繫在一起。

這一歷史敘述對於 20 世紀長大的人們來說，幾乎成為不言而喻的常識，毋庸置疑的真理。但追溯歷史淵源，這所謂歷史常識其實恐怕是晚清民初製造出來的一種很有吸引力的而且相當耐久的歷史敘述。而我們知道，任何歷史敘述本身必然是建築在對另外一些沒有被寫入歷史的史實的否定和遺忘上的，³ 換句話說，一個歷史故事之所以講得圓，就是因為有些其他的故事被掩埋了。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敘述自然也不例外。那麼是什麼樣的其他的故事被掩埋了呢？

女學，才女與亡國

梁啟超的〈記江西康女士〉一文，開筆寫的並不是康女士，而是「中國女學之廢久也」這個大前提。這個題目在晚清可謂熱門，一方面是由於西方傳教士的大力鼓吹，另一方面也來自維新人士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系統反思。教會方面例如美國監理會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的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and Meng Yue (孟悅), "Female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 in Tani Barlow,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³ 類似史觀詳見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shers, 1972), and Michel de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傳教士林樂知 (Young J. Allen, 1836~1907), 在他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書序中, 是這樣闡明其書宗旨的:

本書則以各國女人之地位, 與其看待女人之法, 為比較教化優劣之定格, 此即之名所由取, 亦即可稱為萬國古今教化之論衡, 又即可使讀是書者, 得以自證中國教化所至之真地位也……全書之宗旨, 可用兩言以蔽之: 一曰觀教化者以女人為定格, 一曰凡國不先將女人釋放提拔, 而教養之使成其材, 決不能有振興之盼望。⁴

林樂知歷來以「啓迪華人, 振興女學」為己任, 在晚清維新志士中頗有影響,⁵ 他的所謂「萬國古今教化論衡」就是把世界劃分為三等: 未教化人 (非洲), 有教化人 (東西亞), 文明教化人 (歐美)。無疑林樂知的「啓迪華人, 振興女學」的畢生志願自覺不自覺地籠罩在近代殖民主義語言中, 傳播西方文明與傳播基督教深深地糾纏在一起。

雖然這一套書到光緒 29 年 (1903) 才正式出版, 書中的觀點卻早在他辦了二十多年的《萬國公報》上多次出現, 他文章中對中國文化的批評尤其在甲午戰爭之後越見激烈, 而《萬國公報》在世紀末新派文人中可謂家喻戶曉。⁶ 雖然不少中國讀者恐怕對傳教士的殖民主義語言未必欣賞, 但林樂知的基本結論卻是被廣泛接受的。梁啟超在他的《變法通議: 論女學》

⁴ 林樂知 (Young John Allen),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 《萬國公報》, 1904 年 8 月 29 日。李又寧、張玉法編,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臺北: 傳記文學, 1975), 卷 2, 頁 824。關於 19 世紀西方文化將女人與「文明」「進步」連接起來這一問題, 劉人鵬的近作〈『中國的』女權、翻譯的欲望與馬君武女權說譯介〉中有詳細論述。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7 (1999 年 8 月), 頁 1-42。

⁵ 見 Paul Cohen, "Littoral and Hinterland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Christian' reformers,"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79-80.

⁶ 關於維新派與傳教士的關係, 見王樹槐, 《外人與戊戌變法》(上海: 上海書店, 1998); 王立新, 《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第 7 章。

中直言不諱地說：「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⁷而康有為的女公子康同薇與林樂知的提法更加接近，當然她的文字較林樂知的要雅馴得多：「學也者，固文教野蠻之所攸分也。國也而野蠻半其數，家也而野蠻共其事，不亡何待，不亂何俟？」⁸由此可見，傳統女子之不學這個形象可以追蹤到晚清外國傳教士和國人維新志士的歷史敘述上來，二者雖然意旨不盡相同，但言語口徑卻異常相似。⁹而梁啟超以「女學不興」這個大前提為〈記江西康女士〉一文的開場白在當時的語境中也就顯得很自然了。

累接下來，梁啟超提及兩位近代才女，梁端和王照圓。這裏我們也許會感到行文有些矛盾：既然女學久廢，如何又有才女？然而梁啟超在這裡要反證的論點恰恰是「夫彼二子之所能者，則烏得為學問矣。」畢竟梁啟超與一般外國傳教士不同，他當然知道中國才女的歷史源遠流長，也就是說，中國傳統女子並非一概無知無學。但他變法改良心切，無學當然比有學更能說明問題，更富於煽動性，所以開筆第一件事就是要否定才女之「才」，以確立傳統女子之不學這個形象，因此必須重新定義什麼是「學問」。梁端和王照圓二位，在盛清乃至晚清文壇上頗有名氣，她們不僅有詩文留世而且都有學術著述，王照圓（1763～1851）尤有學名，她的《列女傳》《列仙傳》補注校正承清代漢學訓詁傳統，頗得同代文人贊賞，且有御筆批示。梁啟超也不得不承認她們的學問與其他女子比較，如鳳毛麟角。但舉她們為例，最終還是要說明如此「能為花草風月之言」或「稍讀古書，能著述」，不僅不是學問，甚至和亡國連在一起：「人不學，不知

⁷ 梁啟超，〈論女學〉《飲冰室合集：文集》，卷1，頁37-44。

⁸ 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卷1，頁84。

⁹ Joan Judge 有近文闡述對才女批評的升級是戊戌變法的一個重要側面。見 Judge, "Reforming the Feminine: 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 in Karl and Zarrow eds.,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the 1898 Reform*. Forthcoming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道，群二萬萬不知道之人，則烏可以為國矣」。¹⁰ 也就是說，「學問」之所以需要重新定義是因為它直接與國家存亡緊密相連。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並不只是批評婉約派的舊體詩，他對才女的批評是和對廣義舊學的批評緊密相連的，甚至可以說這裡「才女」之「才」成為「數百年無用之舊學」的指代。¹¹

梁啟超對才女的批評並不止這一次，在他的《變法通議：論女學》一文中，有一段的文字對此講得更明確更徹底：「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¹² 這裡對「古代才女」的批評與上面對梁端和王照圓的批評實質上是一樣的，即無論「成詩詞集數卷」或「稍讀古書，能著述」都不是「學問」，我們略不注意，也許會忘記梁端和王照圓並不是什麼「古代」才女，頂多也只能算是「昨天」的才女。

如果我們把梁啟超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看，他所做的就是通過歷史敘述把「昨天」變為「過去」，變為「數百年無用」的「傳統」，從而割裂其與中國的現代及未來的關繫。據法國歷史學家 Michel de Certeau 的講法，歷史的書寫與敘述「是建築在現時與過去的割裂上的，如果溯源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比如中古、近代、現代，開始時都有一個今非昔比的決定，如文藝復興，如法國大革命。每一個『新時代』於是首先製造出一個話語

¹⁰ 關於梁端材料，見胡文楷編，《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957]），頁 544。關於王照圓材料，見胡文楷，頁 242-45；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8），頁 205-08；and Harriet Zurndorfer, "Wang Zhaoyuan," in Clara Wing-Chung Ho,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New York: ME Sharpe, 1988), pp. 227-30 and Zurndorfer, "How to Be a Good Wife and a Good Scholar at the Same Time," in Léon Vandermeersch, ed., *La Société civile face à l'Etat dans la traditions chinoise, japonaise, coréenne et vietnamienne* (Paris: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1994), pp. 249-70.

¹¹ 梁啟超，〈三十自述〉，1902 年 12 月作，見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上集，頁 363-68。

¹²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 1，頁 37-44、卷 1，頁 39。

空間，認定在此之前的都是『死去了的』。」假如我們同意 Michel de Certeau 的講法，那麼我們將不僅需要審視歷史本身，而且不能不關注歷史敘述的必要條件，具體地說，「現代」這齣戲得以在晚清開幕，也是建築在對過去的割裂上的，這個「新時代」製造出的話語空間包括女界革命，而新一代女子得以登場的必要條件就是「昨天」必須變為「古代」，「才女」必須變成「古代才女」，再變成傳統文化的標幟。梁啟超大筆一揮，歷史敘述萬事俱備，新一代女子的第一個典型形象康愛德於是登場了。

國際舞台上的新女子（舊士子）

寫過女學不興的誤國，梁啟超頗戲劇化地筆鋒一轉，以歷史第三人稱繼續道：「梁啟超持此論以憂天下，鄒凌瀚曰，請言康女士。」有「憂天下」，才有康女士的出場，才有敲邊鼓的鄒凌瀚，而這位鄒氏，下文還會出現，是梁啟超朋友，梁啟超就是從他那裡首先聽說康女士的故事的。

〈記江西康女士〉正文側重寫兩點：女士幼孤與大學畢業典禮。先看孤兒出身：

女士名愛德，江西九江人，幼而喪父母，伶仃無以自養，吳格矩者，美國學士有官籍者之女公子也，遊歷東方，過九江見之，愛其慧，憐其窮，挈而西行，時女士才九齡耳。既至美，入小學中學，遂通數國語言文字，天文地質算法聲光化電繪畫織作音樂諸學，靡所不窺，靡所不習。

在梁啟超筆下，康女士的養母背景頗含糊，似乎大家閨秀，但以其隻身旅行，又很現代；她來中國的目的亦不甚清楚，似乎祇是遊客，但早在 1870 年代遊歷九江這樣一個內地的中小城市，也不能不說略有一點奇怪。但無論怎樣，康愛德幼孤，則無疑是一件好事，¹³ 否則也不能窺習「聲光化電」

¹³ 晚清新小說中外人抱養中國女嬰的故事頗有幾處，詳見拙作 *Tales of Translation*：